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五一期 ——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8e)

【本刊专稿】	是谁下令军管总政？	余汝信
【人物春秋】	温玉成“文革”沉浮录	陶朱问
【史实辨正】	我所知道的温玉成	迟泽厚
【历史一页】	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	钱 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是谁下令军管总政？

• 余汝信 •

关于1967—68年的总政治部，官方断言：“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公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企图把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搞垮。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次年十月，又对总政治部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1〕

文革中曾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在其回忆录中也有与上述断言口径一致的说法：“1967年1月，陈伯达、江青支持总政治部内部造反；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要他们‘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5月，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违反周总理提出军队文艺团体两派要联合演出的要求，支持一派演出，挑起武斗事件，诬陷总政领导是黑后台。到了7月25日，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此总政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诬为‘判官’，正副处长被诬为‘牛头马面’，一些干事也成了‘小鬼’。使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从此瘫痪。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2〕

是谁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上述官方的断言缺乏主语。李德生也没有言明，对总政派出军管小组的“他们”是谁？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总政军管是“一场荒诞的闹剧”，那么，李德生以上所述说的最终酿成这一场闹剧的过程是客观的吗？

显然不是。

一、“扶不起的天子”

1967年1月4日深夜，周恩来在劝阻准备翌日召开批判陈毅、叶剑英大会的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代表时谈及全军文革小组和刘志坚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军队文革小组。刘志坚只是初步的检查，你们的揭发，对我们很有帮助。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伦不类。刘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应该向文革请示（康生：既不请示，又不报告）。如关于文艺单位的‘三点指示’，今天才查出。江青同志是顾问，又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也没有向她报告，又没有请示林副主席。这三条是完全违背‘紧急指示’的。全军文革组织形式不对，必然有问题，上不向主席、林副主席请教，也不请教中央文革，刘志坚每次出席中央文革会议（江青：大多数会请他参加），不说。林副主席、萧华同志不在京，他就派了工作组。

“全军文革中也有反对派。唐平铸、胡痴、谢镗忠、李曼村都提过反对意见，他根本不听。你们有人提议，陶友鉴同学提出全军文革要改组，这有道理。我同萧华商量，可以考虑”。（3）

“1·4讲话”后的第二天，刘志坚靠边站。1月11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萧华仅为副组长之一，总政被削权。李德生说，陈伯达、江青支持总政内部造反，我们未有看到此说的依据。但周恩来以上的讲话，不是更接近于鼓励唐平铸等人内部造反吗？

1月6日，萧华自己说：“在总政治部揪出了梁必业，现在又揪出了刘志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揪出了史进前这修正主义分子”。这是否萧华自己也在支持总政内部造反呢？（4）

1月19日晚，军委扩大会议对萧华作了若干批评。当晚休会时，徐向前宣布：这个会没有结束，不准向下传达。但话音未落，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当晚就将会议情况外泄。翌日，北京城里当即出现批萧的大字报，接着，北京军区的人抄了萧华的家。

杨勇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惟事态发展反而导致了中央众人一致的保萧和杨勇自己的倒台。周恩来1月29日说：“杨勇有很多错误，他不尊重林副主席，从不到林副主席家去汇报工作”，“杨勇不斗刘志坚，却搞萧华，杨勇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5）

此阶段毛泽东也明确保萧。2月3日，他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次月，经毛泽东批准，萧华与谢富治、杨成武、粟裕一道被增补为军委常委。

以流行的说法，萧华个人的政治危机，缘自两个月后的“5·13事件”。萧华被指为这一主要是军内两大派的武斗冲突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和操纵者。关于“5·13事件”，目前似乎还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说清楚其前因后果，究其原因，还是如李德生般将事件的责任公式化地归罪于“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事实上，“5·13”前冲派在军内占相对优势，倾向于冲派的，不仅有萧华、还有杨成武，而支持所谓“三军党委”的一派、却处于相对劣势。目前，并没有材料支持“5·13”武斗冲突是一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的说法。它与文革

中众多的突发事件一样，是两派矛盾激化的产物，却决非有什么周密的幕后的“预谋”。

“5·13”后表态支持“三军联合演出”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周恩来。“5·13”造成了萧华政治上的被动，但决非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任何人（包括林彪）给萧华定性，萧只要认真检讨，没准还可以过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萧华自己的“不检点”。而将萧“不检点”的事往上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杨成武（这次，是杨成武“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了）。毛泽东得知萧华在东躲西藏中竟还有如此闲情逸志，可以一边写检查，一边拈花惹草，龙颜为之大怒，直斥其为“扶不起的天子”！毛的这句内部“最高指示”被迅速传了出去（这就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搞浑了），也就最终决定了萧华垮台的命运。惟江青事后对此过程有一段讲话：“解决萧华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结果把萧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对解放军不好，是抹黑。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制止，始终没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这样就打偏了”。〔6〕

虽然是打偏了，也要倒（按江青事后的说法，不打偏更要倒）。如此说来，萧华被打倒的泰半责任，还不是在于他自己吗？

二、“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至于李德生说及的1967年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和同年7月25日林彪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其实都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亲生女儿李讷。

李讷为毛泽东与江青所出。文革前，为北京大学学生，1966年11、12月间，化名“肖力”，到解放军报当“记者”。她是如何到解放军报的？当年在报社工作的邢志远后来写有一篇《那年奉命寻李讷》，内有生动的描述。据邢回忆，当年戚本禹曾对她们说过：“她（笔者注：指李讷）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胡痴，即当时的解放军报代总编辑。

“肖力”到报社不到两月，即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于1967年1月13日以该队名义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报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字报一出，报社上下都知道了肖力的来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刚刚在上海发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行动会否在《解放军报》重演？人们都在拭目以待。〔7〕

1月7日，林彪在得到毛泽东的书面同意后，给解放军报社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碍着毛泽东的面，林彪对肖力的大字报不得不表示支持。但亦同时在信中对肖力的“造反”划定了一个范围：“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社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8〕

李德生指责林彪“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他为什么不能照实说林彪不得不支持的是毛泽东的女儿呢？况且，即使是毛的女儿，林彪也暗示了他的支持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范围的。

肖力大字报一出，那就不是戚本禹所说的胡痴管她，而是她管胡痴了。据邢志远说，由肖力所领头的革命造反突击队，从此左右了军报的运动。

1967年7月25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各人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百万军民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期间，肖力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林彪，向林反映了总政

的文革运动情况。据肖力回到军报后向身边的人透露，林彪对她再度表示了支持，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8月23日，肖力等三人以“新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又写了一张题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年初接替胡痴任军报总编辑的赵易亚。次日凌晨，陈伯达赶至解放军报社，对刚刚宣布成立的以肖力为首的军报新总编辑组表示支持。肖力到军报仅只大半年，即正式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本人亦由一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正军职“高干”。〔9〕

据知情者说，肖力的活动范围并不囿限于军报之内，且还扩展至整个总政机关（军报本属总政管辖单位）。而据中央文革成员穆欣后来著文说，翌年初，肖力还兼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10〕

据知情者说，1967年10月20日，肖力召集总政各派头头开会，在会上正式对外传达了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表示支持的那句话。平心而论，林彪这句话当然不能够说是对的。然而，毛泽东不是早于1966年3月也将中宣部指为“阎王殿”吗？毛不是更说过“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吗？〔11〕林彪这句话，不过就是毛泽东类似说法的翻版罢了。况且，传达贯彻林彪这句话的，不正就是毛泽东的亲生女儿？如果李德生们认为林彪应该受到指责，那么，毛泽东及其女儿不是同样也应该受到指责吗？

三、军委办事组政工组

李德生说：“从此，总政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亦与事实不符。梁必业早于1966年初批罗时已受牵连，刘志坚亦于1967年1月已靠边站，梁、刘的问题，都是萧华自己宣布的，而且都是肖力传达林彪讲的那句话半年前甚至一年前的事。

惟萧华被毛斥为“扶不起的天子”之后，不仅总政治部，全军文革小组亦实际停止了运作。8月16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萧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萧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12〕

应该注意到的是，1967年1月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及8月该小组停止活动，都是周恩来出面宣布的。在军内并无职务的周恩来，实际一直深度地介入军队事务。

所谓以吴法宪为首的领导全军文革运动的小组，当时并无一正式名称。9月，随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回京，增加杨并指定为组长，该小组方正式定名为军委办事组。所办之事，也有所扩延，不止限于军内文革。11月，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小组成员。11月2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成立，刘锦平为负责人。〔13〕

12月8日，林彪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各人接见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军报组全体人员。林彪称：“政工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实际上一个是解决思想问题，搞好思想革命化；一个是解决组织问题，搞好组织革命化”。〔14〕

林彪的本意，是将政工组的工作范围局限于军内，但实际上并未如其所愿。12月16日凌晨，戚本禹、杨成武接见中直文艺系统一些单位的军代表和各单位革命群众代表。戚本禹

宣布：“11月12日江青同志在中直文艺系统的代表座谈会上曾经讲过，林副主席已经下命令要杨成武同志、军委办事组选几个军、师级的干部，来管文化界的事情，现在杨成武同志已经把人都调来了。一个是王宝功同志，他原来是沈阳军区空军的。一个是贾军同志，广州军区来的。还有一个是魏宏武同志，他是二十一军调来的。今后几个样板团，就归他们来领导”。“中央文革请军委办事组，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来管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的这几位同志受江青同志领导。日常的事情主要由他们来管”。（15）

杨成武接见时也说：“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决定，中央直属文艺口和各个样板团，总的是在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领导下。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在贯彻江青同志意图下，协助工作。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底下的文艺办公室负责”，“他们在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直接请示江青同志。我们协助，卫戍区协助”。这就等于将本来隶属于军队系统的军委办事组的下属机构，沦为了江青、中央文革的工具。

刘锦平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对笔者说，在这种不正常的架构及氛围之下，其实他主要管的还是江青交办的诸如样板团、保定胶片厂等事（当时保定胶片厂生产的电影胶片主要用于拍摄样板戏），劳累不说，还经常受江青的气，而江对他还是十二万分的不满意。（16）

刘锦平是参加过长征的江西老红军，历史上曾先后在红一军团、115师、四野工作过，还曾担任过林彪所熟悉的四野43军127师政委，应是林彪所信任的干部。但江青不喜欢，林彪也没辄。翌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刘锦平与张秀川、李天焕等都不再是办事组成员。此后，王宝功、贾军、魏宏武也先后回原部队，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也如文革中的很多类似机构般（如军委文革小组），有一个热烈的开头，及后，却无声地悄然消失。

四、毛泽东下令军管总政

尽管毛、林都一再声言必须“政治挂帅”，惟进入1968年，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机关，总政不仅对外早已失却领导功能，内部也处于一种十分无序的状态。

这一年的10月，毛泽东亲自下令，对总政实行军管。

时任总政军管小组副组长的刘江亭，多年后曾对笔者忆述了当年进驻总政的过程。（17）

刘江亭，河北蠡县人。1937年参加中共革命。上世纪40年代末，曾任善战的四野45军135师参谋长。时军长黄永胜（后陈伯钧），师长丁盛，师政委韦祖珍，政治部主任任思忠，后来均为中国政坛上的知名人物。建国后，刘曾任教于南京军事学院，1958年调任陆军第21军63师师长，后提为军参谋长、副军长。1967年随部由晋入陕，曾分工负责西北工业大学的支左军训工作。

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刘江亭突然接到命令：即到京参加总政军管工作。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北京派来的一架小型飞机已抵西安接他。匆忙之中，他什么都来不及带即上了飞机。

到北京后，刘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事隔多年，刘还记得其大意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18）

笔者追问：在毛泽东之后，有提及林彪吗？刘再三确认：没有。刘还说，这个命令印数很

少，大概也就是100份左右。

刘江亭未能回忆起命令下达的具体日期。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透露，命令是10月18日下达的。

由于刘江亭曾在黄永胜手下工作过，人们很自然将刘到总政与当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联系起来。笔者也就此问过刘，刘断然否认道：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中央要兰州军区派一位副军级干部去总政，本来是要梁济民去（梁时为陆军第21军副政委），经21军军长胡炜找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商量，换为刘江亭，此过程与黄永胜无关。

军管小组成员共八人，王宏坤挂帅，刘江亭负责具体工作，其他六人来自各大军区，一是师级，余为团级。小组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海军来的。

刘说：进驻总政不久，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听取了总政军管小组的汇报。王宏坤叫我讲，我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 1、总政的“社会状况”，即人员构成情况；
- 2、总政的案件；
- 3、总政的群众思想反映。

1969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总政问题。据吴法宪当晚对军管小组成员的传达，毛讲话的大意是：不要把总政看成是坏的，只要领导工作做得好，和清华一样，以后也会赶上去的。林彪接着说：总政都是部队选拔的尖子，不能一锅砸。

如此说来，总政军管的目标，主要是机关内部。惟毛的讲话总使人感到有些疑惑：既然不坏，何必还要使用军管这种极端的形式？

刘说，军管小组开始住总政机关，大概三个月后叫搬出去了，说是为了安全。以后，是在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借住、工作，原总政机关的人员除被关押者外，也都集中到高军院，文工团也搬去了。到北京后，开始给我配的是伏尔加，后来一次换了萧华的美国车给我，我说，以后再也不要开这个车来。还给我配了红机子。

刘又说，我到总政前，总政领导层被抓的人，都是中央碰头会批准的，军管小组到总政后一个人也没抓，其实能抓的早就抓走了。军管以后，总政二级部正副职以上干部的专案，都是海军管的。李德生本来在军委办事组分管总政，他1969年到总政并没有管军管这一摊事，军管与重新组建总政是两条线。即李不管王，王也不管李。直到1970年4月新总政宣布成立，军管这一摊子人和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还说，王宏坤将我放在第一线，平时他从不到场。我情况不明，工作难于开展，王又批评我抓得不紧，没抓到点子上去。我请王宏坤参加会议，要求他到高军院来，他不干。还组织人批判过我两天，语言刻薄，并且说我是总政“5·16”的头子。在此情形下，我也就打报告要求回原部队，还找过黄永胜。黄开始不放，我一直在总政呆了十五个月，1970年4月，黄才同意我走，说：回去当你的副军长吧！

黄永胜当时说这话的意思，多少是认为刘江亭有点不识抬举。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刘其实还算颇有自知之明，也颇有点先见之明。回部队后翌年7月，刘提为21军军长。以后，虽也有些坎坷（1975年降为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在总政的一段经历也受到不断的审查（也没

查出个什么结果来)，但总比留在总政呆着强，留在总政，还不知是什么下场！

以上刘江亭的回忆，笔者是原话照录。事隔多年，记忆总可能有不甚准确之处，但大体的线条轮廓应该是清晰明了的：一言以蔽之，对总政实行军管，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达的命令。

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

李德生在总政结束军管后即为其最高首长，对军管局面的形成过程，应该有所了解。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他的所谓派出军管小组的“他们”，其实只是毛泽东一人？难道他真的不明白，这一过程如果说是“一场荒诞的闹剧”的话，导演者也正是他所敬重的毛泽东本人？李德生的回忆录写到此处时，他是真糊涂呢还是假糊涂？（2005年7月）

注释：

- （1）徐才厚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70—71。
- （2）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389。
- （3）（5）（8）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1967.3）。
- （4）同（3）书，页34。史进前，原总政保卫部部长，1966年9月已免职。
- （6）《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指示》，见《江青文选》（武汉：新潮大革命委员会政宣部，1967.12），页272。
- （7）肖力等的大字报见军艺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星火燎原报编辑室：《星火燎原》第2期（北京，1967.1.13）。
- （9）见二二零七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20期（北京，1967年8月24日）。
- （10）穆欣：《劫后长忆》（香港：和平图书新天出版社，1997），页386。
-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31。
- （12）新潮大革命造反临委会宣传部主办：《新潮大通讯》第50期（武汉，1967.9.8）。另有资料称接见时间为8月10日，确切时间待查。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员；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叶群，总参办公厅党委常委，林彪办公室主任。
- （13）李天焕，时为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空军党委常委，民航总局政委。
- （14）编者佚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9.7），页930。
- （15）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斗批联络总站整理：《戚本禹、杨成武同志讲话》（1967.12.16）。王宝功，时任沈空政治部副主任；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魏宏武，陆军第21军63师政委。
- （16）访问刘锦平记录（1999年4月25日）。
- （17）访问刘江亭记录（2002年9月13、14日）。
- （18）王宏坤时任海军第二政委。

~~~~~  
【人物春秋】

温玉成“文革”沉浮录

• 陶朱问 •

会打仗却不一定搞政治。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温玉成身不由己地进入政治高层，又身不由己地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跌宕起伏，演出了一幕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文革”期间的九大，是林彪、“四人帮”集团阴谋乱党，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一次大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其个人权势达到鼎盛。

在这次引人注目的大会上，一大批“文革”新贵进入权力中枢。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当时势头看好的政治“新星”温玉成却落选了，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

温玉成成为九大惟一个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主席团成员。

“文革”中，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在众多将星中脱颖而出，一夜之间，被擢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成为当时军界与政界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温玉成却莫名其妙地从北京消失了。以后，在经历了林彪“九·一三”、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后，温玉成不是像他的大多数战友一样，洗雪沉冤，东山再起，而是陷入了迷雾一般的人生窘境，直至1983年，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干预下，他的“人生黑洞”才勉强有了个说法。

在群星闪烁的开国将军中，温玉成应该算是一个能征惯战会打仗的将领。如果不是这样，他不可能15岁参军，17岁就成为红军的一名中级指挥员；也不可能在战争年代屡建奇功，成为林彪麾下的主力之一。

可惜，会打仗却不一定搞政治。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温玉成身不由己地进入政治高层，又身不由己地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跌宕起伏，演出了一幕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

#### ◇ 奉调北京

1968年1月1日，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副司令这两个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在广州军区，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是军区司令员，温玉成为其副手。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

时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林彪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当时，他正被黄永胜指使的造反派斗得不可开交。离开广州，对他而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依照惯例，林彪在毛家湾寓所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平时感情不易外露的林彪，很是怀旧地谈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温玉成勇猛善战，过去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 ◇ 执掌京畿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泽东。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问候道：“主席好。”

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到卫戍区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文革”中，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拱卫京师，警护中央领导安全。位高权重，却不好干，温玉成的前任傅崇碧就是因为得罪了林彪，被秘密贬至沈阳。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随着“文革”乱相的加剧，老帅纷纷落马或靠边站，军委领导班子为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温玉成进入中枢，成为办事组十成员之一。

当时，毛泽东对他颇为信任的。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一次，毛泽东特地把温玉成叫去了解工宣队进驻高校的情况，温玉成老老实实回答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听了他的汇报，赞许他讲了老实话。

不过，即便受到如此重用，温玉成始终觉得不舒心。因为顶头上司黄永胜像一幕阴云，罩在他头上挥之不去——这时，黄永胜也调来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依旧在其约束之下。

尽管这样，温玉成还是踌躇满志。由于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的信任，温玉成一时名重京华。

## ◇ 夹缝之间

在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温玉成置身军界的权力高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协助周恩来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二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三是协助谢富治管理江青一手抓的“样板团”。

对于他的工作，其遗孀宋琬明这样对笔者说：“我们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这段评述，前面是赞扬，中国人愿意把所有正派人都说成如此；而后面则十分中肯：温玉成对政治一窍不通，处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良知、感情、欲望，少不了要经常发生种

种冲突，人的内心难免会时虎时猴，时道时佛时妖。一个并无多大政治野心的军人，置身政治漩涡之中，开始未必不想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把上级交给的事都办好。但是，那时的政治斗争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对与错，是与非，亲与疏，上与下，统统首先要服从需要，服从集团或个人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既相互看不起又相互吹捧的政治集团中，既然不能两边讨好左右逢源，惟一能暂时保全的办法就是死心塌地站在一方，温玉成没这么选择，是对也是错，是幸也是不幸。

#### ◇ 刘庆棠事件

当时，文艺团体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留了下来。

刘庆棠凭借饰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角而平步青云，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并得江青宠爱。为此，曾有人叹言：“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曲芭蕾舞。”恃宠而骄的刘庆棠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恩来，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主管样板戏的谢富治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这样吧，我事多，工作忙，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不料，温玉成写好检讨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温玉成从此得罪了江青。

#### ◇ 黄永胜出国与军装事件

江青与林彪不睦。黄永胜原本想出出国，见见世面。好不容易捞到一个去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机会，岂料，江青却说：“他不配。”江青一反常态，坚持要温玉成顶替黄永胜出访。

温玉成叫苦不迭。他根本没有这个心思。而林彪、叶群夫妇一直在这件事上毫不让步，坚决要黄永胜出访，并视作是同江青集团的一次斗争。眼下，让温玉成替代黄永胜，江青这不是在制造矛盾吗？

后来还是毛泽东点了头，黄永胜才遂了心愿。江青还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保守派的根子“广州军区上头还有”，明眼人一看，上头的人便是黄永胜。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温玉成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军委办事组依然不同意。邱会作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事情未能办妥，江青自然迁怒于温玉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温玉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际，又收到了一个更烫手的山芋。

#### ◇ 李必达事件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秘书进来报告说，黄总长的秘书李必达同志在楼下会客厅等，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到你手上，由你转交江青同志。

当时，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年仅27岁，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他对黄永胜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九大”前夕，他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指明要一些代表投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

几经踌躇，李必达毅然以一个党员的良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林彪集团尤其是黄永胜的行径。信写好后，怎样传递，李必达费尽心思。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何不让温玉成转交给江青，以江青和林彪已经日渐公开的矛盾而言，这封信江青肯定会上达天听。再说，温玉成与黄永胜不和，他应该不会推辞的。

于是，李必达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拿着信到了温玉成住处。开始，温玉成推辞道：“我和江青不太熟，不便转交。”

须臾，秘书再次报告说，李秘书讲啦，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就不走了。

温玉成叹了口气，没再往深处想，只得点头同意了。然而，他看完信后，神情大变，出门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李必达这才忐忑不安地离去。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知道温玉成与黄永胜不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不可。烫手山芋接上手，温玉成辗转反侧，如就热汤。交，势必得罪林彪，不交，则江青迁怒。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思来想去，温玉成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可半年后，却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客观地说，温玉成的内心是倾向林彪的。

温玉成的这一着棋并未讨好林彪。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立即将李必达关押拘捕，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也如骨鲠在喉。更有甚者，“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恩来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所以，到了晚年，温玉成常对人说：“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被开除军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发配到南方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受了不少苦。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平反。

#### ◇ 被贬成都

按理，党的“九大”时，温玉成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被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前排就座，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却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温玉成打电话找到叶群，叶群装作茫然无知，并表同情，实际上，正是叶群和林彪力主拉下温玉成，以解他们“温玉成知恩不报”的痛恨。

林彪、叶群满以为此举可以讨好江青。谁知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温玉成又被江青推入“炮膛”，藉此打击林彪。

不久，北京天安门召开声势浩大的支持毛泽东主席“五·二〇”声明大会。温玉成走上城楼，遇上江青，忙上前主动招呼，江青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径直离去。温玉成立时呆若木鸡。

未几，温玉成再次接到江青电话，说芭蕾舞名角白淑湘在京西宾馆排戏很辛苦，生病无药，让温玉成立即送点药去。温玉成立即命人相送。岂料，过不几天，江青把温玉成找去，训斥道：“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为什么药只送给白淑湘而不送给刘庆棠？”

温玉成瞻顾四望，如履薄冰。

1970年6月4日，林彪约温玉成单独谈话，走入林办，一向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随后，林彪、叶群又向温玉成说，江青要求把他“立即抓起来”，是林彪想出了办法，让他远去成都避祸。

由副总长降职为军区副司令，温玉成虽然想不通，却无力抗争。

#### ◇ 隔离审查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

9月16日傍晚，温玉成刚刚吃完晚饭，便接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打来的电话，让他去3号院开会，并特别强调，传达中央绝密文件，不要带秘书。

走入3号院，20多个荷枪实弹的干部、战士如临大敌般，警惕地持枪张望。正在温玉成惊疑之际，张国华政委已在楼梯口叫住了他，然后礼貌地邀请他上楼。

“他们还没到？”温玉成走入会议室，一坐下身，愈加好奇。

“没有，”张国华有些尴尬地答道，然后转身关上了门，坐下后，便沉沉地叹了口气，“这个会只有我们两个开。”

温玉成凭直觉，预感到今天叫他来，决不是传达什么文件了。

“老温，”张国华一字一顿道，“我们是老相识了，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略一沉吟，张国华像背书似的说道：“刚刚接到通知，你被隔离审查了。”

“隔离审查？”温玉成张大着吃惊的嘴，一时回不过神。

“那我犯了什么错误呀？”温玉成苦笑道。

“上面说你是林彪的死党，组织上要审查……”

温玉成如同猛地听到一声惊雷，他一下子呆若木鸡、心乱如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分明是被林彪贬出北京，现在却又成了林彪的死党，这如何说得过去？

当晚，他便被秘密关押在邓家花园。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琬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 ◇ 平反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这天，成都军区根据中央通知，将关押了5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

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复原职。

但是，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

其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委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的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

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结论无着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在黄克诚的努力下，1983年，中央军委经过甄别调查，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不过，中央曾明文规定，1955年被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军们，离休时都要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如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就是例子。

温玉成似乎是个例外。

后来，温玉成曾试图证明自己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迫害，并要求恢复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但未果。

大军区正职的待遇没有被恢复，温玉成夫妇悄然来到南京定居。晚年，温玉成的离休生活抑郁而不寡欢，南京军区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种种花草，平静地度过了6年时光。

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74岁。

□ 《南方周末》2005年1月13日

~~~~~

【史实辨证】

我所知道的温玉成

· 迟泽厚 ·

◇ 问题的缘起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以下简称《温文》)。对温玉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令人费解的大起大落的经历作了记述和剖析，特别对他后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文革”前的温玉成并无很大名气。他是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的175名中將之一，在1960年代初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中，他名列第五。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却突然“蹿红”：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仅三个多月之后便又兼任号称“御林军”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接着又成了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迅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本以为可以稳稳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温玉成，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他是12名“碰头会”成员中惟一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年后他又被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据有的权威人士透露，温玉成的失势、遭贬，是因为关键时刻林彪没有拉他一把。然而，更让温玉成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却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到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温玉成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段极不正常的历史。通过对温玉成这段经历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但是，《温文》却犯了写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实，为尊者讳，把温玉成写成只因“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无辜受害者。据悉，此文作者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其生也晚，对温玉成可谓素昧平生。依他的条件，写这类反映复杂政治历史情况的文章，本应十分谨慎，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慎重取舍。而他显然是轻信了某些一面之词，便轻率下笔。

温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将一起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员，温任参谋长。到1967年底，温玉成调总部工作，在广州整整10年。这期间，我先后任军区司令员秘书、作战参谋、办公室秘书科领导。这几个岗位，都同军区首长有密切接触，因而对温玉成的情况比较熟悉。“温文”提到的几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后的个别事件外，我或是参与者，或是目击者，按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提法，我属“重要知情人”。

《温文》曾于2003年在北京的一家刊物上分两次刊载。当时我和广州军区一些老同志看后便深有感触，但出于多方考虑，未予置理。不料现在却又在《南方周末》再次刊出。考虑到《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和影响面，特别是这份报纸就在广州出版，许多看过此文的老同志都认为不能再保持缄默，而应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事实真相，以免是非混淆，误导读者。这里试就《温文》中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出其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 温玉成与黄永胜关系密切异乎寻常

《温文》于多处提到温玉成与黄永胜的关系，说温一到广州军区，便“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此后温玉成处处受制于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温文》说温玉成与黄永胜是“四野老战友”，错了。黄温二人早年虽同属中央红军，以后又都在第四野战军，但二人却从未搭过班子。黄永胜对温玉成并不了解。1957年11月，黄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送来一张温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见：把即将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温玉成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黄永胜在“意见”栏写下了“听说此人很懒，建议不要分到广州工作”。但是总政没有采纳黄永胜的意见，一个月后，温还是分到了广州军区。而更让黄永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温玉成并不懒，而是干劲十足，作风泼辣，工作中还常有独到见解，加之他又对黄永胜异常尊敬，黄永胜十分欢喜，对温大加倚重，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温玉成由此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顶撞。李天佑过去曾任号称“万岁军”的第38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军长，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突出政治，一时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至高无上。温玉成却我行我素，对此漠然处之。1960年代初，国民党军的P-2V夜航电子侦察机经常窜扰大陆，危害很大。解放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都把打P-2V作为首要的战备任务。温玉成公开讲：“什么突出政治？你能把P-2V打下来，就是突出政治！”很多人认为，这不就是早被毛泽东批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吗？在处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上，温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军区政治机关不少干部对温十分恼火，说他“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

这种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借“文革”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而爆发。温玉成很快成为军区机关鸣放和大字报的众矢之的。1966年8月15日晚，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温玉成的大字报，敲锣打鼓，涌入军区首长居住的司令部大院，齐集1号办公楼前广场，“勒令”温玉成接受并朗读大字报。有人手持扩音喇叭，不断高呼口号，许多人还纷纷对温玉成厉声斥责、质问。司令部的不少干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干部的“革命行动”。温玉成的尊严扫地殆尽，狼狈之极。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这些干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刘兴元请愿，要求“罢温玉成的官”。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刘兴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然后又表示他无权罢温玉成的官。不管代表们如何施加压力，刘兴元始终没有松口。这次行动，以后被称为“八一五事件”。成为军区机关干部“站队”的重要标志，许多当时参与“造反”的干部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关键时刻还是黄永胜和刘兴元向温玉成伸出援助之手。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中央军委报告了

“八一五”晚间发生的问题，讲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传来了林彪的指示，对行动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机“捞一把”。后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对刘兴元没有同意罢温玉成的官，林彪说“刘兴元同志是有原则的”。对温玉成，则肯定他“大节是好的”，而且说“温玉成同志是有干劲的”。“有干劲”是林彪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温玉成。

1967年1月底，军队奉命全面“支左”；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军区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任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要温玉成以主要精力帮他抓地方的

“文化大革命”。

1967年6月上旬，黄永胜委派温玉成偕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和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赴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对当时正在发展的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事件的斗争方针、策略，并汇报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中，谁能看出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同黄永胜有什么“较深的隔阂”、“搞不到一起”？

◇ 黄永胜保荐温玉成当了副总长

《温文》称：温玉成是经“叶剑英元帅推荐”，“毛主席一锤定音”，到北京任副总长的。说明作者全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中央高层人事情况。岂不知，当时叶剑英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员而处境艰难，已经“靠边站”了；其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而像副总长这一级干部的任命，也不需经过军委办事组，一般是经林彪认可后，报毛泽东批准。也巧，我是温玉成升迁的经办人之一。

1967年8月，黄永胜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100多人应召进京谈判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和筹建省革委会问题。周恩来先后十多次接见这些头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黄永胜在他下榻的京西宾馆设了一个包括他的两位秘书在内的4人临时值班室，随时向周恩来办公室反映情况，请示工作。我以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负责人身份，领导这个临时值班室。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黄永胜进来对我讲：“你给林副主席写个报告。”于是他讲我记。报告主要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根据我对黄永胜的了解，估计在写这份报告之前，他很可能已将有关问题当面请示过林彪。

大约半月之后，便听说中央军委已任命温玉成为副总长。一天晚上，又是我在值班，温玉成打来电话找黄永胜。值班室很静，温玉成又是大嗓门儿，我在一旁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黄永胜军委的调令“是怎么回事儿呀”？并表示他“水平低”，“干不了”，“不想去”。黄永胜则用亲昵、得意的语气大声地说：“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你赶快来嘛！”几天之后，两派群众组织在京达成协议，黄永胜返回广州。温玉成马上到黄家拜望。没过几天，他便兴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军区机关不少人去机场送行，我也在其中。

◇ 黄温交恶

黄永胜和温玉成的关系后来确实“崩”了。这要从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讲起。

1968年3月下旬，发生了举国震惊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紧急应召进京，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卫戍区司令员。黄、温又在北京聚首。据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原广州军区的干部反映，黄永胜初到北京，温玉成对这位老上级还是比较尊敬的，但在稍后他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进入当时中国最高权力集团，江青又不时委以重任，他似乎逐渐忘记在军内他与黄永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了。

说起江青对温玉成的重用，不少人感到事有蹊跷。1967年6月9日晚，温玉成受黄永

胜委托，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广州军区战备工作和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江青突然从外面进来，直奔温玉成，与他握手寒暄，并对她因事不能听温的汇报而深表遗憾。江青为什么对温玉成如此亲热？她是什么时候、如何认识温玉成的？这让当时在场的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李维英百思不得其解。

众所周知，江青掌握的几个京剧、芭蕾舞剧“样板团”是她的王牌，是她在“文革”中起家的资本。而江青竟把这些“样板团”交给温玉成管。温玉成对此也确实很卖力气。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江青与黄永胜的关系却格格不入，日趋紧张。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江青对黄、温的这一冷一热，自然引起黄永胜对温玉成的猜疑。而更让黄永胜恼火的是，他发现温玉成常以卫戍区司令员的身份向江青汇报军队工作情况。从此两人隔阂日深，终至形同冰炭。黄永胜曾多次在熟人面前讲温玉成是他保举进京的，现在却怀有二心，是“忘恩负义”。黄永胜的后面有林彪。林彪对江青素无好感。在黄永胜和温玉成之间，林彪自然是选择前者。由此，温玉成不但得罪了黄永胜，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都对他怀有戒心，视为异类。

江青的介入，是黄、温交恶的主要外因。

◇ 扑朔迷离的“李必达事件”

《温文》说李必达事件是个错案、冤案，温玉成也受此案牵连，这是对的。但是，此文对案情的叙述和分析却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

李必达入伍前是武汉大学学生，入伍后分配到第41军锻炼，1966年在该军121师362团4连代理副指导员。此时362团政委是曾任黄永胜秘书多年的于贯文，对李必达产生了良好印象。1967年12月底，军区机关从41军为黄永胜选调秘书，此时已升任121师政治部主任的于贯文举荐李必达中选。初任秘书的李必达干劲十足，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于贯文于1968年初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黄永胜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黄永胜夫妇常有接触。作为李必达的举荐人，他自然关心李必达的表现。他曾向担任总长办公室（也称“黄办”）主任的黄永胜夫人项辉方了解李的情况。项说李“表现很好，人老实，能写东西，文字水平超过语言表达能力，首长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关爱备至，光是为他找对象就费尽心机，多次亲自出马。李也知恩图报，他出狱后于1972年写给老领导于贯文的信中依然承认“过去，我对黄、项也有一种感恩的思想”。

李必达与黄永胜夫妇闹翻，始于一场误会。1968年底，“黄办”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这期间，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怀疑，曾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李必达多次检讨都未过关。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内心痛苦之极，多次找老领导于贯文倾诉。一次，于贯文当着李必达的面给项辉方打电话，委婉地指出对李的问题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实在不行，叫他回广州算了”。但是，项辉方一下子来了原则性，坚持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李必达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1969年4月28日，他最后一次来看于贯文，突然冒出了一句：“难道我就任凭他们摆布不成？！”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向毛泽东、江青告状，扳倒黄永胜，或者还可绝处逢生。他哪里想到，他请温玉成转呈江青的信，却被温玉成交到叶群手里！

李必达的告状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温文》说，李必达在“九大”前夕，“利用参知机要的

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这段文字本身就语焉不详，作者大约是想说林彪操纵“九大”中央委员选举，却误为“九大代表”——代表已经都到会了，还选举什么？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自始至终都是由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进行的。我是参加了“九大”会务工作的，林彪并未、而且他也没有条件插手中央委员的选举活动。再说，李必达向毛泽东、江青写信时，“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都已结束，他的信岂不成了马后炮？

周恩来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次通话，或者有助于揭开李必达告状信内容的谜底。大约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三天的晚间，广州军区党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几天来的应变工作情况。会间休息时，丁盛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电话机，要通了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他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周恩来的话表明，李必达的信里讲的，主要来自偷听黄永胜的电话。在李必达出狱后回到北京接受专案组审查时，他也承认确实偷听过黄永胜的电话。黄永胜在电话里究竟讲了什么犯禁的话呢？据项辉方说，李必达曾向她汇报，一次黄永胜在与叶群通电话时，大骂江青“想当清朝那个女人”。李必达当时反映这个情况，当然是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因为黄永胜住地小翔凤胡同是居民区，他讲话一向是高嗓门儿，李必达是怕隔墙有耳，造成不良后果。从以上情况再联系到李必达刚被关押之后，叶群和吴法宪都曾讲过：李必达的主要问题是“挑拨中央关系”，因而，李必达在信中很可能讲的是黄永胜等人私下议论、攻击江青的情况。在当时，反江青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弥天大罪。黄永胜历史清楚，战功卓著，像他这样的老革命，最怕的就是这种“现行罪”。倘若黄永胜的这条罪状能够坐实，即使他一时不被打倒，告发者的境遇却可大大改变。这方面此前早已有过先例。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有人写文章颂扬李必达敢于在林彪、黄永胜等人如日中天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揭发他们的“阴谋活动”。但是，没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体内容。不少局内人对信的内容表示怀疑。有的人提出：李必达说自己如何先知先觉，干吗不把信全文公开发表，让大家来品评、受教育，并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

李必达的老首长于贯文，大约是最关心李必达事件、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此事复杂关系的一人：李必达是由他举荐给黄永胜的；李必达在“黄办”受到怀疑，是他极力在两面做工作，试图化解李必达与项辉方的紧张关系；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又眼巴巴地看着李必达被逮捕，被押上由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随后他又极不情愿地被派往李必达的家乡调查李的家庭出身，继而到广州了解李在狱中情况；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竟又被某些人说成是“迫害李必达的帮凶”，还说他“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则又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是一丘之貉），备受凌辱，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李必达事件成了于贯文晚年无法摆脱的梦魇。而落实政策后的李必达，在给于贯文的信中和通电话时，则一再表示感谢过去于贯文对他的关心爱护，并对于贯文因他而受株连深感遗憾。我与于贯文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挚友。1993年10月，他与我从探讨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就李必达事件长谈了9个下午。在场的还有曾任刘兴元秘书和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的一位老友。事后我们共同整理了一份长篇记录稿。在谈到李必达给江青写信的动机和此信的内容时，于贯文说：“我同情李必达的遭遇。但是，他把自己同黄永胜、项辉方的矛盾，说成是政治、路线之争，他向江青告状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回避了他是为项辉方所迫而导致矛盾转化这一事实，对此我不能苟同。‘九大’刚开过，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当时一片拥护声，他当时就能看出林彪等人是坏蛋？我不相信。”

◇ 温玉成失势之谜

温玉成的失势来得意外、突然。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连遭3次重大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1969年4月末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温玉成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他作为中央“碰头会”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顺理成章。谁知他却根本未被提名。相反，与他资历相仿、原来并非“碰头会”成员的李作鹏、邱会作却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九大”之后，“碰头会”停止活动，温玉成只剩下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头衔，完全成了黄永胜的下级。

第二次打击是1970年6月，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等于是宣布处分的处分。

第三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温玉成被当作林彪的同党关押审查。他本来是林彪在位时遭贬成都的，他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受林彪等人迫害的，谁知还是在劫难逃，而且一关就是5年有余！

一般人都认定，温玉成遭受的第一、二次打击，林彪、黄永胜难脱干系。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人选，是毛泽东委托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提名的。前面已经讲过，温玉成进京不久便因与江青关系异常而引起林彪、黄永胜的猜忌，那么，在酝酿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黄永胜（黄的后面是林彪）的态度可想而知。至于温玉成遭贬成都军区，则是“九大”人事安排的继续。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其职权相当于已往的军委秘书长，而林彪则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对温玉成的任免，都要经由他们“把关”。

但是，不少人忽略了一点：即使在“九一三”之前，对温玉成的安排，也须得到江青的首肯。当温玉成调成都的消息刚刚传出之时，曾有一位与黄永胜关系极亲密的人问他：为什么要把温玉成调走？即使调走，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广州军区？黄永胜回答说：“是江青要赶他走！他过去在广州搞得那个样子，还怎么回去？！他到成都去，梁兴初对他总还了解嘛！”梁兴初是成都军区司令员，以前曾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对温玉成当然熟悉。黄永胜的话少了一句潜台词：既然江青要把温玉成赶走，他乐得顺水推舟。黄永胜的话还表明，倘若是林彪、黄永胜想把温玉成调离北京却不合江青心意，她完全可以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加以阻挠，林彪、黄永胜是抗不住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刚刚几天，温玉成便遭到伤害最重的第三次打击，说明江青不曾忘记了他，他无论到了哪里，也跳不出江青的手心儿！

温玉成为何由受江青重用的红人而突遭遗弃和迫害？揣测和说法甚多，主要有两种“版本”。

其一是以吴忠为代表的“揽事招祸”说。吴忠是温玉成的同僚：温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时，吴任第一副司令员；温调成都军区后，吴接任司令员；他还是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他对江青、温玉成都有深刻了解。1977年，他因“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我与他接触频密，彼此无话不谈。一次谈起温玉成与江青的关系，他说，温玉成坏事就坏在不知利害，揽事太多：江青让他管“样板团”，他可谓竭智尽忠，不遗余力；他意犹未尽，见江青忙得风风火火，很想为她减轻一点负担，便主动做了一些江青并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认为温玉成是对她进行“特务活动”，于是翻脸。

其二是温玉成夫人宋婉明（《温文》作琬明，错了）的说法，说温因管“样板团”不称江青心意而获罪。1987年，我途经南京，曾特意去拜望在那里安家的老首长温玉成。不巧，他

下乡钓鱼去了，他的夫人宋婉明接待了我。我们也是老相识。交谈中，我直言不讳地问起温玉成为何得罪了江青？她说，事情还是由“样板团”引起的：一次，江青当众指责温玉成对“样板团”管理无方，特别是芭蕾舞团管理混乱，导致演员基本功和演出质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温玉成便掏出记事本来，说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这段时间对“样板团”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以毛泽东化身自居训惯了人的江青，岂容温玉成当众辩白顶撞！登时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叫喊温玉成“撒谎”、“不老实”！从此，温玉成便交上了厄运。

两种“版本”，哪个更能反映实际情况，或者两者都有道理？请读者自己判断。

◇ 史作贵在存史 贵在真实

《温文》的错误还可举出很多。例如，为了突显温玉成没有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外和 不公，竟连温是九届中央委员这一铁的事实也不承认了。这其实只要翻一下九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便一目了然了。再如，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其实，他并没这种“殊荣”，即使地位比温玉成再高的人，也很难受到毛泽东的单独召见。又如，说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告状信之后，便“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直到半年之后，才“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收到信的当天，温玉成便立即把信交给了林彪的妻子叶群，于是，才有了“李必达事件”。又如，成都军区奉命将温玉成隔离审查，《温文》说向温玉成传达上面指示的只有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一人，而事实是在场的还有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这是一个重要情节，不能因为不久之后梁兴初也莫名其妙地遭到审查就避而不提。……

写史不同于写文艺作品，不能随心所欲，尽情挥洒，更不能凭个人好恶任意褒贬剪裁。特别是对近现代革命史和重要历史人物，更要以对历史、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排除私心杂念，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秉笔直书，真实地反映历史，才有可能使后人以史为鉴，从前人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能急功近利，更不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随意制造的哈哈镜，是当不得镜子的，最多只能博人一笑。

2005年6月2日初稿于广州

2005年7月2日定稿

原载《南方周末》2005.07.28 有删节。此文为未删节稿

~~~~~

#### 【历史一页】

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

• 钱 江 •

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两次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丑行，要求中央派专人调查，予以解决。没想到，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信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的广大老干部，并以此为由，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大好形势顿时发生逆转，刘冰也随之再次经历了生命中的巨大挫折。

#### ◇ 磨难中的温暖

1975年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万人大会，先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宣读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然后安排15人上台进行“批判”发言，还美其名曰，这是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其实，自11月以后，清华大学没有一次的大批判会上是允许“辩论”的。就在18日的大会召开时，刘冰被人带到清华大学“工字厅”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面对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坐下，收听批判会实况。刘冰非但失去了上台辩论的权利，连面对标语改个坐向都不被允许。

通过广播，刘冰细听发言者的批判，心中无比愤怒和震惊，因为这些发言充满了谎言和诬陷。迟群的一位亲信发言说，迟群“艰苦朴素，公私分明”，有一次睡得晚抽烟不慎烧了公家的被子，事后如数赔偿云云。然而刘冰清楚，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会场上拿出的证据是临时制作的。

清华大学的“大批判”接二连三，刘冰和惠、柳、吕4人被拉到各个系轮流批斗。他们在心灵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刘冰仍能感受到世间真情。

11月底的一天下午，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后，项南的女儿小米进屋来看望刘冰。刘冰和项南，建国之初都在团中央工作，彼此熟悉，但他对小米此时前来仍感意外，问道：“你是怎么来的？”

项小米回答：“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有看到人。”

刘冰对她说：“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

小米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

原来，她随父亲项南到清华、北大来看大字报，先到了北大，项南就留在那里，要女儿进清华园看望刘冰，带话问候，要刘冰注意身体。

她告诉刘冰，现在就是清华和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动作。但是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毛主席写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往来了。她对刘冰说：“刘叔叔，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也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

项小米的来访使刘冰感到了一丝温暖。

这天下午和晚上都比较平静，将近深夜11时，刘冰突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声音断断续续。根据以往被批斗的经验，刘冰迅速穿好衣服，还拿上了大衣下楼开门。

开门一看，来人是工程物理系学生宋章元。

年轻人进屋后匆匆问候了刘冰的身体情况，然后说：“我今天夜里是专门来看看你。你们4个人的信，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抄下来了，很多人用复写纸复写了许多份邮寄到外地。大会上批判者说信的内容都是假的，同学们根本不信。迟群说开会是大辩论，要通过辩论搞清问题的性质。同学们在宿舍里说，既然是大辩论，怎么看不到刘冰他们出来辩论呢？有的同学说，大概是不敢让他们出来吧。这些话都表达了对迟群的不满。迟群、谢静宜在学校里不得人心，同学们表面上不敢说，实际上都同情你。你们并不孤立，你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说完他就走了。

## ◇ 在痛苦中煎熬的日子

批斗会无休无止，好在这些东西刘冰在“文革”之初已经领教了一遍，如今的承受力强了一些。他渐渐发现，批斗大会之间的“提审”密度逐渐提高了。提审者人数就那么几个，但是追问很多，主要是追问为什么一开始要找胡耀邦转送这封信而不找别人？后来为什么一定要邓小平来转信？刘冰揣测，这是诱迫他承认自己的后台就是邓小平和胡耀邦。这是坚决不能说的。于是每次提审总是以提审人高声叫骂“不老实”而告终。刘冰后来指出，这种批斗加提审和“文革”初蒯大富的手段差不多，不同的是迟群、谢静宜们不打人，这是比蒯大富们高明的地方。

持续批斗到12月下旬，刘冰终于病倒了。有一次被批斗之后，头晕得几乎不能走路。晚上9点钟，他躺在床上，还有人前来想把他拉到系里去批斗。

第二天，刘冰和妻子苗既英相互搀扶着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门诊求治，被诊断为“急性肾盂肾炎”。就诊医生坚持人道主义精神，要刘冰立即留院治疗。清华大学向医生打招呼，不准留刘冰住干部病房。但是内科主任不畏权势，亲自为刘冰安排了干部病房，还安排他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同住。经过治疗，到1976年元旦，刘冰的病情基本上得到控制。1月9日，周恩来逝世。刘冰闻讯后非常悲痛，在病房里长时间流泪沉思。

1月10日，清华大学派人从医院里叫回了刘冰。

接下来的批判持续到4月间，内容大同小异，重复的批判词说了千遍万遍，亦渐渐使人麻木。

5月，专案组将刘冰等4人安排到位于大兴县的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劳动改造”，与刘冰同编一组的还有在“文革”再次挨批判靠边站的清华大学另一位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又过了几天，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师、胡耀邦的儿子刘湖也来到农场，同刘冰编在一起。这种安排使刘冰提高了警惕，不同他们说话，以免授人以柄。

在大兴县团河农场，刘冰几乎每天都接受批斗。有时一天要分上午、中午、下午、晚上4次进行。令刘冰感慨的是，农场只有一个人敢接近他且毫无畏惧，他就是清华大学老工友高文有，当年已经60多岁了。他不管迟群那一套，总是说，刘冰，你吃过晚饭就到我那里来。他们在一起喝茶聊天，高文有还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高师傅出身好，造反派拿他没办法。

刘冰回忆，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还有一位青年教师承宪康给他带来了力量。

承宪康曾几次带刘冰去“批斗会”会场，看到四周没有人时，就小声告诉刘冰说今天是什么人召开批斗会，主要说些什么。承宪康还嘱咐刘冰：不要紧张，批判还是老一套，他们问什么你应付几句就行了。为了将来，你要注意身体，饭要吃好，别生病，这很重要！

听到这样的话，刘冰真切地感受到：人间自有正义在。

刘冰终于盼到了“文革”的终结。1976年10月14日，已转到清华校办工厂劳动的刘冰得知“四人帮”覆灭的消息，激动之情无法形容，工人们也纷纷向他道贺，说：“这下子，你的问题该解决了。”

## ◇ 曲折的平反过程

不料想好事多磨。10月16日，北京市委派出联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还要继续“批邓”，批刘冰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毛主席定下来的云云。但对刘冰的批判实际上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1977年春天，北京市委的联络组撤走，刘达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批邓”完全终止。10月，刘冰被恢复组织关系。但是“两个凡是”的阴影还在，刘冰一案经过“御批”，这个禁区很难打破。

今年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刘冰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加快平反。但此时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行动得并不快，或许他心里也有疙瘩，对刘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承认上书毛主席一事错了有意见。胡耀邦将刘冰的信批给清华大学负责人刘达处理。也许是因为事涉毛泽东的批示，又拖了一段时间。

机会终于来了。1978年6月23日，刘达向邓小平当面汇报清华大学的工作，在场的还有方毅、蒋南翔。汇报后，刘达向邓小平提出：我还有一个难题要请示。邓小平问：什么难题？刘达说：是刘冰同志的问题。

邓小平问：“他有什么问题？我怎么不知道？”

刘达说：还是关于他那两封信的问题。因为受到批判时，刘冰同志作了检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北京市委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主张平反，市委说不能翻案。

邓小平说：“我明白了，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当时刘冰正在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6月26日，刘达前来看望，高兴地通知他：“你的问题解决了。”

刘达说：“你这个问题，是我来清华时首先想到的，但这个问题很大，毛主席有过批示，所以我采取的方针是先易后难。先解决其他问题，然后解决你的问题。现在小平同志为你说话，你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你安心养病，等待分配工作。”

但是又过了两个月，北京市委没有任何消息。刘达即向五机部部长张珍推荐刘冰到北京工业学院工作。他对张珍说，这件事要请示一下中组部长胡耀邦，只要耀邦同意就行。

张珍很快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马上说：你找刘冰本人谈谈，只要他自己同意，组织部没问题，赞成。

刘冰上书的问题，至此才算解决。经过一番考虑，刘冰找到张珍，表示不适宜在北京这个环境下工作，主要是原市委第一书记还在主持工作，对于他，刘冰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当年“上书”毛泽东，明明是向他也递送了一份，他却指责说这是“搞桌子底下活动”。打倒“四人帮”后，又是他多次宣布刘冰不能翻案。刘冰感到在这位领导手下很难协调，谢绝了去北京工业学院的安排。

很快，中组部和教育部提出了几个方案：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兰州大学都缺主要负责人，刘冰可以去其中的一处工作。此时，刘冰想到了在甘肃工作的宋平及其夫人陈舜瑶。当年，

陈舜瑶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与刘冰共事。宋平作为国家计委负责人之一，常常在下班后乘公交车到清华大学看望陈舜瑶，再一起回家。刘冰对宋平印象极深，和他也很快熟悉了。刘冰认为，宋平曾任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秘书，为人正派。陈舜瑶人品好，平易近人。刘冰想，自己在“文革”中损失了10年时光，现在要为人民多做工作，需要一个好环境，他选择了兰州大学。

11月下旬，清华大学党委为刘冰等人召开了平反大会。刘冰宣布：“刘冰等同志写信告迟群、谢静宜，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揭发问题完全属实。说他们是诬告，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翻。撤销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职务应予恢复。”

此时刘冰坐在主席台上感慨万千。三年前的11月，也是在这个礼堂的主席台上，迟群、谢静宜小人得志，颠倒黑白蒙骗世人。而如今，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已经将两个政治小丑抛下了路基。

#### ◇ 大河奔向海洋的尾声

刘冰于1978年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次年任甘肃省副省长，1982年任甘肃省委副书记，1983年任常务副书记，1986年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任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如今，84岁的刘冰定居北京。离休后，他动笔撰写多卷本回忆录，第一本书写的就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特别是上书毛泽东前后的经历。他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人即使亲身经历了某个重大的历史事变，恐怕也不敢说就能够深刻理解事变的本质，这也许就像古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这件事就留待读者和后人去细细思索，从容探讨吧。”

在探讨各位历史人物在这一“上书事件”中种种不同的面貌时，刘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经历了长时期的党内斗争，才慢慢领悟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是非常漫长的。在这个过渡阶段的党，包括共产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也不能不受到身处的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即使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的某些东西。因为今天的社会是从过去的社会脱胎而来的，这就是历史的传承和因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历史的教训。

□《党史文苑》2005.9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